

我与父亲许良英

许 平

今天是父亲百岁诞辰，谨以此文表示纪念。

一、成年之前

我出生于 1954 年，比哥哥许成钢小 3 岁半。虽然只差了 3 岁半，但我们与父亲的关系却是天差地别：他从小受到父亲特别的教育，比同龄的孩子聪明得多，父子俩见面总有说不完的话，感情非常深厚。而我因幼时受到父亲的教育极少，父亲对我来说是很陌生的。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①生不逢时。我 1 岁时，他因做过“胡风反党集团骨干分子”方然的入党介绍人，被“停职反省”一年；我 3 岁时，他因“猖狂反对反右运动”被打成“极右分子”；这时虽然未离开北京，但已无闲情逸致来共享天伦之乐了。我 4 岁时，他被迫回农村老家劳改，直到 1979 年被“改正”，重回科学院，20 年间曾回京 5 次：

时间	在京逗留	回京目的
1961.4.	1 个月	右派摘帽，回京探亲，向科学院汇报劳改情况
1963.1.	3 个多月	为编译《爱选》（《爱因斯坦哲学著作选集》）作准备
1972.3.	2.5 月	向商务交出《爱选》手稿
1973.12.	11 个月	建议将《爱选》扩充成 3 卷本《爱集》（《爱因斯坦文集》），编译完第 1 卷
1975.10.	2 年半	编译《爱集》第 2、3 卷

因此，在我成年（18 岁，1972 年）之前，与父亲共同生活的时间只有我 4 岁之前的 4 年和 1961 年与 1963 年的两段短暂时光。而在这些时段里，他在家的时间也很少：58 年前他在中关村上班，只有周末才回到城里的家。

②不受重视。在这些共同生活的时段里，我和父亲从未单独相处过。由于成钢比我懂事得多，又爱说话，爱提问题，因此父亲的注意力必然完全被他吸引过去。而成钢感兴趣的问题，我是不可能听得懂的，也就没有任何记忆。

因此，在 18 岁以前，能给我留下印象的父亲与我的谈话只有一次：58 年离京前的那天（6 月 7 日）晚上，他平躺在床上，让我坐在他翘起的膝盖上，对我说，他就要回老家张家渡了，老家的风景是如何如何的美，还有牧童骑在水牛背上吹笛子。他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回老家，骑在水牛背上看书。我连忙说“愿意愿意”。

1961 年 4 月，父亲从老家回来，问我：“你认得我吗？”我说“认得”，“我是谁？”“你是许良英”，“许良英是谁？”“是爸爸”。这是父亲经常提起的一段典故。那时，他离京 3 年，彼此还不很陌生。

就在那个月的 12 日，苏联宇航员加加林完成人类首次太空航行，也成为中国妇孺皆知

的英雄。父亲买了一幅宣传画贴在我的床头：近景是一个身穿宇航服，驾驶宇宙飞船的大头娃娃，远景是个小小的地球。那时我在科学院幼儿园上大班，已经学完了汉语拼音，并认识了一些汉字。“六一”前夕，老师要每个小朋友给爸爸妈妈写封信，汇报自己在幼儿园的“成绩”，我写道“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在幼儿园里学会了很多本领很多知识，……我长大像加加林一样坐火箭去旅行。”没想到，这封信的手迹被发表在6月2日的科学院机关报《科学报》上，父亲把它珍藏起来，多年后拿给我看，我竟几乎记不得了，因为我当时只是为了应付老师的“灵机一动”，从未有过什么“航天梦”。

上小学后，父亲送给我一本带图画的小学生字典，这使我从小爱查字典（后来查《新华字典》和《四角号码字典》），没书可看时甚至拿字典当书看。因此，虽然66年文革时我只上到小学5年级，以后再未上过语文课，读过的书也很少，但在78年高考时，我的语文成绩比我所认识的所有人（包括成钢清华附中比他还高两届的校友）都高。这要得益于这本小字典。

61、63年父亲两次回京，都带我去买最新出版的《水浒》小人书，前后共买了12册（全套21册）。看《水浒传》是父亲儿时的兴趣之一（他刚听说“共产党”时，便把它比作梁山泊的英雄好汉），这使我也从小喜欢看那些仗义疏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故事，也是我以后对历史、军事感兴趣的起因。但父亲对军事、战争都极其反感，以至对体育也很反感，他曾自豪地说，他上中学时，除了体育不及格，其他功课都很好。

父亲回老家后，与他通过几封信，但对我这样童蒙未开的愚钝少年来说，书信中的寥寥数语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也没留下什么印象。当母亲不让我们与父亲通信时，我“很听话”，马上停止了与父亲的通信，而成钢则不那么“听话”。

一段景色描述，一幅宣传画，一本小字典，半套小人书——这几乎就是我18岁以前父亲对我的教育的全部内容。虽然他花的时间很少很少，对我的影响却不算太小。但是对于他本人，我是很陌生的：

1972年3月他回到北京，那时，我在河北迁安首钢勘探队当钻探工（以后改为钳工），母亲写信要我回京与他见面，我4月29日下午回到北京。相别9年，父子俩已十分陌生，谈话时，我甚至不敢看他的眼睛，只是低头看着桌子。他那带有浓重浙江口音的“普通话”我也听不大懂，不时要借助纸笔。

二、文革期间

从父亲的日记中可看出，他见到我后，很想与我亲近起来，也非常关心我，但是他与我亲近与关心的方式却使我无法接受：

那天下午，父母和我在分别9年后初次团聚，晚饭后，没有谈9年来各自的情况，却谈起中央12号文件和党内十次路线斗争！过了两天，他带我去王府井新华书店，买了《马恩选集》、《列宁选集》各一套，及《马恩全集》第20卷（包括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送给我，他要我先学《自然辩证法》。这是他在继12本《水浒》小人书后送给我的第一批书，这个步子迈得未免太大了！

我当时已18岁，如果在正常情况下，应该已基本学完高中的数理化 and 世界历史，也许能去试着读《自然辩证法》。而我当时的情况是：没上完小学五年级就赶上“文革”，只在初二时“复课闹革命”上了3个多月的课，但根本学不到什么知识。母亲担心我像前两届学生那样，初中“毕业”就去插队，恰逢“学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母亲在学部所属的近代史所工作）的“五七干校”招工，就匆匆把15岁半的我送到干校去开拖拉机，一年半后“干校”解散，又被分配到勘探队当工人。因此，我受到的正规的学校教育只是小学5年级，幸亏我还进行了自学。而自学的原因仅仅是“好玩”：文革初期，在家熬过了一年多极

其无聊、度日如年的时光，接到上中学的通知后，找出成钢的课本自学小学 6 年级的算术，一开始学就觉得非常好玩，以后又学了初一到高二的代数，背着母亲偷偷看了两卷半《中国通史简编》（母亲单位编的，为何要偷偷读，看到后面就会明白）和两卷本的《苏联通史》，而对三角、几何、物理、化学等等一无所知；对武则天以后的中国历史和俄国以外的世界历史也是一无所知。在这种背景下学习《自然辩证法》显然是看不懂更不会有兴趣的。

父亲曾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写到，有个“北大物理系四年级的学生……我发现他连热力学第二定律也没搞懂，……，我忠告他：首先应认真搞懂物理学的基本概念，然后再去思考哲学问题”。可见，他要我在尚不知“物理学”为何物的情况下学《自然辩证法》，不啻于对牛弹琴。要学马列著作，也需要了解近代西方历史和共产主义运动史，这些我都没看过（以前家里有很多这方面的书，后来都被成钢“偷运”到黑龙江去了）。我对马列和哲学不感兴趣，使他的巨大热情受到打击，难免对我不满意。

除了学马列，他还要我关心政治，积极参加文化革命。在他的鼓动下，我和两个同事在勘探分队贴了大字报，企图推动分队的批林批孔运动，他大为高兴，但毫无效果。

当然他也关心我最感兴趣的对数学、物理的自学：我学完高中代数后，开始学初中物理，一开始就遇到 $\sin\theta$ 之类的东西，向他请教，他给我抄了希腊字母表和一大堆三角函数公式，但没有文字说明和例题，我只好停下物理的学习，几个月后回到北京，到东安市场的旧书店买来文革前的中学教材《三角函数》（我早期的自学都是这个方法），学完后再继续学物理。学完高中物理后，他问了我几个关于牛顿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的问题，我回答后，他认为我概念很清楚（以后也多次提起）。我受到夸奖，鼓起勇气拿着他翻译的《物理学的基础》问他，我能读懂这本书吗？他说要大学物理系毕业才能读懂。我的言外之意是想请他介绍一些更深的物理书给我，他或许是没听出我的言外之意，更大的可能是他希望我多关心政治。他在一篇日记里写道：“我发觉他有只专不红的倾向。我指出这是危险的，今后应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注意改造思想，树立起巩固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因此，在七十年代，他既未与我谈起过曾经使他产生狂热兴趣的近代物理学和物理学史，也未谈起过他后来经常津津乐道的在浙大物理系学习的趣事，而这本来是可能使我们真正亲近起来的。

父亲认为“只专不红”“是危险的”（我才学到高中，离“专”还差得十万八千里），这与母亲的观点完全相反。

父亲被打成右派后，母亲受到连累与打击：被开除党籍、降级、剥夺了研究中共建党史的资格，被迫交出花了几年心血采访整理的珍贵史料，即将分娩的唯一的女儿胎死腹中，甚至她的性格也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根本变化。痛定思痛，为了使我不要重蹈父亲的覆辙，她希望我长大后当工人（因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不要当知识分子。而在我家所处的环境下，要当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很容易，要当“非知识分子”却很难！为此，她对我进行了全面的“愚民教育”（下面有些“措施”也许是她的性格与那种环境下极坏的心情使然，有些是为了自保，并不全是为我“设计”的）：

1. 在思想上，从不鼓励我好好学习、有理想，只是向我灌输“孝顺”、“勤快”、“诚实”、“助人为乐”等传统道德，尤其反复强调要“听话”：在学校听老师的话，在家听她的话；
2. 不说话（不讲故事、不讲知识、不讲道理，连家常都很少讲，连我在学校的事也极少过问）；
3. 不与外人来往（除了她家的亲戚和一两个朋友）；
4. 不让我看课外书（不愿给我买书，父母给成钢买的书，成钢看完后也都被处理掉）；
5. 竭力阻止父亲对我的“负面”影响。

最后一条与父亲有关，不妨讲得具体些。

60年代初，父亲每次回京总要和母亲吵架，吵得非常厉害。那时我太小，听不懂他们争吵的内容，只是觉得很害怕。

72年，父亲对我说，他这次回京先见到母亲，问起我和哥哥的情况，母亲说我一切都好，而说到成钢则不禁潸然泪下：“成钢和你走了同样的道路，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同地富反坏分子一道劳动改造”。我从迁安回京后，一天吃晚饭时，他提到59年庐山会议时彭德怀给毛的万言书，认为万言书说的都是事实，对毛的批评也很温和，“没什么了不起”。母亲立即打断他，说“你别胡说八道”，于是又开始了激烈的争吵。一个认为自己讲的都是事实，应该让孩子知道历史、知道真相；一个说：你当年不听劝告到处乱放炮，害了自己、害了孩子、害了家庭。这是我第一次听懂了他们的争吵，竟是为了对我的教育！

74年，父亲为了让我了解他，给我看了他的《自传》。这本16万字的《自传》是69年在浙大私设的“监狱”里写的“交代材料”，审查结束时不让带走，70年在故乡又重写了一遍。他复杂坎坷的经历使我十分震惊，对他不禁肃然起敬，并为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骄傲。当时他尚未摆脱对毛的迷信，文中随处可见“毛主席语录”和“革命语言”，但毕竟透露了许多历史事实，可能对我产生“负面影响”，母亲知道后，又与他大吵了一架。

在那个“唯成分论”的年代，父亲的“成分”不可能不使我受到歧视：7岁时母亲带我去考“景山学校”（一所高水平的实验学校），考试没问题，只因父亲是右派而被拒之门外；64~65年母亲要去甘肃“四清”一年，再到山东劳动半年。按规定，母亲一人（63年与父亲离婚）带有未成年子女可以不去，但单位领导不准，只好将我和哥哥寄托到六外公（母亲的六叔）家。当时成钢已考上清华附中，住校，母亲想把我转到成钢刚毕业的“香山慈幼院”去住校，以便少给六外公家添麻烦。但区、市教育局都因父亲是“摘帽右派”不敢拍板，多亏近代史所副所长黎澍先生给同是历史学家的主管文教的副市长吴晗写了“条子”，才得以转校。若干年后母亲告诉我，以后填表时，“家庭出身”可以填“革命干部”了（算是摆脱了“出身”的影响？！），我自己的“成分”也从“学生”变为“工人”，算是遂了她的愿。

母亲的这种教育理念，在正常环境下绝对是不可理喻的。但如果毛死后由“四人帮”当道，或像朝鲜那样出个毛二世、毛三世，难道她的这种做法不是具有先见之明的英明之举吗？那时，我可能是全家唯一没有“政治污点”的幸存者了。成钢说，这是母亲在“竭力保护我们”，但这是在极不正常的环境下，用极不正常的手段进行的保护，其后果是使我在性格上、能力上出现严重的弱点：

性格极其内向、不敢也不善于与生人打交道、不会讲话、记忆力极差、知识面很窄、遇事没有主见、没有质疑-批判精神、分析判断能力很差。由于有这些弱点，又导致在某些方面极度的自卑与胆小。而这些弱点会恶性循环，因此虽然明知它们极其有害，却又无法自拔。

由于母亲的“呵护”，以后父亲对我的教育也有所顾忌，不敢太“胡说八道”，不再过多地要求我关心政治了，也因此始终不能与我“亲近”起来。例如：

74年的一天父亲对我说，他终于“看破红尘”了，并问我懂不懂“看破红尘”的意思，我不懂，他说这是《红楼梦》里的话。当时，中国“四大名著”我都没看过，只看过《水浒》小人书。我家虽然有很多书，但小说只有一本《欧阳海之歌》，其他有名的文学书一本也没有：《唐诗三百首》还是我向同学借来读的。75年毛泽东发动“批水浒”运动后，书店开始卖四大名著，我才买来看。父亲说的“看破红尘”，是指他因得到一些关于江青丑行的“内部消息”，从而看破了毛泽东的真面目，彻底破除了对毛的迷信。但他并未向我透露这一切，连“看破红尘”是什么意思也未向我解释。

为了与我亲近，他除了关心我的学习，还带我去科学院图书馆借书、查资料，去拜访他

的老同学邹国兴。

第一次去科学院图书馆，路上和馆内有很多人向他打招呼，但他只是简单支应一下，没有多余的话。我很纳闷，问他是否认识这些人，他说不认识，我问他们怎么认识你？他苦笑着说，57年开全院大会批判我，出名了。显然，这些人都是同情他的。

父亲常带成钢出去串门，而正式带我一人出去串门，大概只有一次：拜访邹国兴叔叔。邹是父亲浙大物理系低一级却同宿舍的同学，当时是北大教授，住在北大校园内一座普通的老式宿舍楼，没有厨房、卫生间，只有两间房子：里间是他们夫妇的卧室，外间是客厅、书房兼女儿的卧室。他说，他48年去法国留学，第一个导师是居里夫妇的女婿，诺奖得主约里奥-居里，他是实验物理学家，而邹想搞理论物理，于是又跟了理论物理学家，诺奖得主德·布罗意，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法国有两种博士学位，国家博士只有国家的一个委员会有权授予，因此很难得（最近从网上查得：钱三强是约里奥-居里的学生，也得到法国国家博士学位）。他66年回国，是北大物理系最年轻的教授，当时在给工农兵学员上最后一门物理课（好像是XX场论）。父亲指着堆在地上的一捆捆从法国海运回来的书和空荡荡的书架，问他为何不把书整理好，他说，刚一回国就碰上文革，什么也干不了，现在给工农兵学员讲课，哪里用得着这些书。他不善言辞，说话声音不大。他夫人文化水平不高，却非常爱讲话，热情地向我们介绍墙上挂着的她的许多画作。以后，邹叔叔为《爱集》的编译工作出了很多力。文革结束后，可以发挥他的聪明才智了，却在1980年与夫人口角后突患心肌梗塞英年早逝，实在可惜。以后父亲经常关心他的遗孀和女儿的生活和工作。

有一年，分队长把我找去，说要调我去地质组学习、工作，并发给我一把三菱尺和一套大三角板。地质组的成员都是大学或中专毕业的，是我们分队唯一有知识分子的单位。我因为怕生，自学中遇到问题从未向这些人请教过，以后可以直接跟着他们学习了。我把这个喜讯告诉父亲说，“我总算有自己的专业了”。父亲回信说，他看到我的信后流了眼泪，并寄给我一本地质学的世界名著。后来，学地质的事不了了之。我当时不理解，像他这样性格坚强、经历坎坷的人，为何会为这点小事流泪。几十年后回想这一幕，可以试着从我的角度去理解他当时的心情：

他出生、成长在军阀混战、国共内战、外族入侵，几乎要亡国的战争时代，家在农村，父亲早逝，母亲不识字，而他却能受到很好的教育（他历来对立本小学、海门慈幼院、东山中学、浙大高工，特别是浙大的教育是相当满意、充满自豪的），还能看到大量的课外书。为了反抗国民政府的腐败专制，他放弃了“做当代物理学权威”的梦想，冒着杀头的危险干革命，为的是革命成功后，有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中国，为的是他们的后代有幸福的生活，能受到更好的教育。万万想不到，他的儿子，出生、成长在和平年代的首都，父母、亲朋多是高级知识分子，不仅从小在学校接受的是残缺不全、充满谎言的愚民教育，更可悲的是在家里也受的是愚民教育，连课外书也没得读。12岁失学、15岁当童工，连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的机会都没有，仅仅得到一个非正式学习的通知就受宠若惊，岂不悲哉！“解放”后，多少人因为“出身不好”被剥夺了接受教育和上大学的权利，文革十年，更有无数青少年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权利，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化、教育浩劫。难道这就是他抛弃心爱的物理学，多少年舍生忘死追求的“事业”？想到这些，怎能不“使英雄泪满襟”？

学完高中数学、物理后，我想向成钢学习，学点电子技术。父亲给我寄来两大厚本精装的原版英文书，这是他在浙大高工读过的美国的大学电子工程教材。以我当时的英文水平与知识水平，根本看不懂这样的书。还是成钢的建议适合我：先学一本中专的高等数学（大学高等数学中的“ ϵ - δ 语言”不太好懂），再读清华大学为工农兵学员编的一厚本电子学教材。当我学完高等数学，开始读清华的教材时，来到了跌宕起伏的1976年——1.8.周恩来去世，

4.5.四五运动，7.6.朱德去世，7.28.唐山大地震，9.9.毛泽东去世。

那时，成钢早已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回到北京，成为“待业青年”。

“十一”，我回京过节并休“存休”（将平时和周末加班的工时存起来，8小时算一天，集中休假）。10月9日，父亲应约带着我和成钢到颐和园与吕东明伯伯及其子女以及赵中立叔叔见面。我们7人租了一条小船，划到昆明湖正中央，看看附近几百米内没有船，吕伯伯才神秘地向我们透露了“可靠的内部消息”：“四人帮”被逮捕了！那天天色昏暗，下着蒙蒙细雨，凉气袭人，但大家十分兴奋，上岸后又冒着雨转到石舫，因雨越下越大，才被迫回家。

次日，我回勘探队上班，他却因受凉感冒，咳嗽不止，拖到12月大口咳血，住进结核病院，一度病情危重，虽然奇迹般地迅速康复，但此后身体就大不如前了。

三、上大学后

77年恢复高考，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学历史，但想想自己记忆力太差，一定学不好历史，因此只能学理工科。78年考上武汉水运工程学院，造船系，船舶流体力学专业。高考前觉得，只要能考上大学，毕业后有自己感兴趣的专业、感兴趣的工作就满意了。越邻近毕业，想回北京的愿望就越强烈。毕竟从我4岁父亲回老家劳改时起，一家人就极少团聚，文革时更是天各一方。如今，父母哥哥都在北京团聚，只有我一人“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

【我在武汉4年，家里发生了很多喜事：成钢以初二学历考上清华研究生、父亲平反—恢复工作—60大寿、父母复婚、搬家（从城里的两间小平房搬到中关村的四室一厅）、成钢结婚】不免北望家乡“倍思亲”，唯恐落得永远“遍插茱萸少一人”的境地。于是决心通过考研究生回北京。因北京没有造船方面的高校和科研单位，只好选个相近的专业——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机电所”，搞水轮机流场计算（后来读博时又转到“结构材料所”，搞混凝土坝温度场与应力场的仿真计算）。

我小时候，家里是“门庭冷落车马稀”，很少有人光顾；如今回到北京已经今非昔比了：经常看到家里高朋满座、佳客盈门，真正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大家

或口若悬河、侃侃而谈，如饕餮盛宴；

或唇剑舌枪、你来我往，似兵戎相见；

甚至拍案而起、恶语相向，真的是毫无忌惮！

听父兄和那些满腹经纶的客人们一起侃大山，真是莫大的享受：说的是各种匪夷所思的消息、入木三分的分析和光怪陆离的奇谈怪论。可惜，我的记忆力极差，往往客人滔滔不绝地讲了5件事，事后，我若能记得三两件事的皮毛就算不错，一段时间后，这点皮毛恐怕也记不得了。而父亲的记忆力非常好，能大段大段地、一字不差地复述客人讲的话。有时还能一字一句地复述几十年前某某人讲的话。

有时，从早至晚客人不断，一拨没走一拨又来，晚上客人走光了，父亲两眼充血、声音沙哑，连呼“累死了”，但仍乐此不疲。有时到午饭时，客人要走，他意犹未尽，一定要留客人吃饭，并亲自下厨煮一锅烂面条（后来“与时俱进”，改为速冻饺子炖汤圆）款待客人。有一个从武汉赶来的老友，原打算在我家住几天，好好聊聊，没想到第一顿饭就被他那不敢恭维的厨艺吓得赶紧搬走，再也不敢回来了。如果来看他的人太少，他会觉得寂寞，尤其是住院时，更希望有人去看他。楼里经常有邻居装修，冲击钻、电锯的噪声吵得父母不胜烦躁，我劝他们搬到我在水科院的宿舍去住几天，他怕别人找他聊天、给他打电话找不到他，不肯搬，只是白天到水科院躲清静，晚上仍回来住。

由于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和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他写文章很少打草稿，而是采用一种与众不同的程序：首先，翻箱倒柜大量地看书、查资料；其次，躺在躺椅上闭着眼睛打腹稿，在心里将文章的题目、结构、逻辑关系甚至关键句子都想清楚；最后才拉开架势动笔开写，

而且一动笔，就一笔一画地用复写纸复写两三份，写好后，略作修改即告杀青。

从 88 年底开始，父亲的心脏病（严重早搏）就时常发作，以致在 89 年 1~2 月，征集由他和施雅风伯伯发起的呼吁政治改革的联名信的签名时，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学潮发起后，他因身体不适，很少出门。我则每天出去转，回来向他汇报。“4.26 社论”的发表引起公愤，次日一早，大批学生从我家楼下路过，进城游行示威。我赶紧带上相机，下楼骑车赶到游行队伍前面，用相机记录下学生一次次冲破警察的警戒线，过关斩将，如入无人之境的壮观场面。怎奈场面太大，站在地面无法窥到全貌。恰巧复兴门立交桥附近有个建筑工地，高高的脚手架正是拍摄游行场面的最佳位置，于是有十几个人先后爬上脚手架，等待游行队伍的到来。这时，来了一个穿工作服、戴安全帽的工人，抬头喊道：“脚手架不结实，你们赶紧下来，别给学生惹麻烦”。听到喊话，大家很快都从脚手架上下来了。试想，如果喊话的是官员或警察，大家绝不会“听话”，而对这样一位普通工人的一句简单朴实的话，互不相识的一群人为什么会这么“听话”呢？“别给学生惹麻烦”说到了点子上。大家都爱护、支持学生和学生运动，害怕政府“找茬”污蔑、诋毁学生运动，找到镇压的借口。因此，任何可能“给学生惹麻烦”的事大家都自觉地不做。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在随后的一个多月里，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事：在没有警察的日子里，北京市的治安出奇的好，据说连小偷都“罢偷”了。我将脚手架的事告诉父亲，他很感动，以后多次向别人讲起，作为他常提到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不可侮”和反驳“一搞民主就会乱”的一个证据。

6.4 后，开始了严重的“红色恐怖”，他的三十多个熟人被捕或被通缉，不少人劝他躲一躲，他坚决拒绝，并作好了一旦被捕就绝食，以死抗争，作谭嗣同第二的准备。但作为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前地下党负责人，他深知不能蛮干，必须讲究策略。他让我将一批日记、文件带到水科院藏了起来。

在 1983 年父亲主编的《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简史》第一版中，成钢撰写了“计算机硬件”及“计算机与社会”两节。出版后，“计算机与社会”与父亲撰写的“结束语”受到好评。90 年代再版时，成钢已去了美国，于是父亲让我来增补“计算机硬件”一节。我虽然天天用计算机算题，但对硬件知之甚少。他告诉我几个科学史的期刊，但从中未找到与计算机史有关的文献。在图书馆跑了一段时间，收集到一些巨型机、精简指令计算机等方面的史料，还未动笔，遇到一个读在职博士的机会，只好将已收集到的资料匆匆整理出来交给他，不得不放弃《简史》的工作。我对父亲表示抱歉，他表示理解，又带着我拜访了软件所的查良钿（金庸的堂妹）等人，请她们继续这一工作。我整理的资料最后也由他亲自修改完成。虽然这个工作没有善始善终，但使我初步了解了美日欧巨型机各自的特点和不同的发展路径，对巨型机的体系结构有了些粗浅的认识，其中有不少技术以后都转移到我们天天使用的微型机上。

父亲脾气比较暴躁，有时会发些“无名业火”。以前每当他发火，我即使有委屈也不敢“顶嘴”。随着岁数的增长，我的脾气也涨了。我 50 多岁时因为极小的事与父亲发生过两次激烈的争吵，两次他都骂我“自私”。当时以为他是脱口而出的气话，也没在意，以后想想，这种在盛怒时冒出来的话，应该是他埋在心底里对我的基本看法！这问题就严重了。

回想我从 15 岁半参加工作以来，在干校、勘探队和水科院，对工作从来是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极其努力，有时甚至是“玩命”，也从来不追求名利。有两件小事可作为我“不自私”的证明：①77、78 年两次高考，我们 7 个人的钳工班有 3 人报名，另两人都请了长假回京备考。在这种人生的关键时刻，我却怕影响生产，一天假也没请，完全利用业余时间和“存休”进行备考。②读博时因工作出色，导师（也是课题组长）对我非常满意，他去美国探亲期间，将课题组的财政大权——“内部支票本”交给我这个新人保管，以便我可

以报销一些东西，犒劳犒劳自己，我却一分钱也没动（当然，这种小事我都没对家里讲过）。看了他的自传和日记后，觉得我的这些特点也许是继承了他的遗传基因，所不同的是，我的体质比他好，不像他，玩命以后往往要病倒。

也许他是指我对工作太投入，对家人关注太少？但他年轻时又何尝不是如此？！

因此我实在想不通他为何认为我自私。后来想想，他也许是以他最喜欢的那句爱因斯坦的名言作为评判标准的：“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

比起“同谋罪”，说我“自私”，已经是大大的“法外开恩”了。

这大概就是他 40 年来总要我关心政治且与我永远不能亲近的根本原因。

其实我也不是不关心政治，我也经常看报（在勘探队时，我要母亲每星期给我寄一次《参考消息》），每天听、看官方新闻，基本读完《毛选》，马恩列的著作也读过一点。他所说的“关心政治”显然远不止这些，至少还应包括：大量、系统地学习理论，时刻关注重大事件，对丑恶的事件和言论进行公开的批评，在政治事件中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像他曾经的那样。

我一直认为他所说的那种“关心政治”是需要有条件的，而我恰恰不具备这些条件：

大量、系统地学习理论需要有很强的记忆力，很高的悟性和分析能力，这是我不具备的。

关注重大事件的实质是对现实与历史中丑恶言行的信息的积累。这些信息从我天天接触的官媒中是得不到的，我性格内向，因此其他信息来源很少，在家里虽能听到许多这类信息，又因记忆力差而积累不起来。

没有积累，也就没有“批评”的弹药与“投入”的动能。而“投入”还需要群体行动，要会说、会组织、会联络，这些都是我的“弱项”。

此外，“关心政治”还要有个目标。只有对现实的不满，而又找不到解决之道，是最危险的状态：懦弱会迷茫、颓废，勇敢者会铤而走险，遭到灭顶之灾。1974 年之前，父亲的目标是什么，大概他自己也不太清楚。“看破红尘”以后，经过深刻的反思，他捡回曾经被他忘却了的民主理念，逐渐明确了目标。这时我却因有了自己喜爱的专业，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并因时刻忌惮着自己的弱点，对他和他的朋友们呼唤民主与人权的壮举和进行民主启蒙的艰苦努力，只作了个近距离的旁观者，顶多能帮点小忙。

随着目标的明确，我的思想慢慢发生了转变。

先是看了父母写的许多有关民主的文章和《民主的历史》的手稿，听了成钢在清华讲的关于中西制度比较及其历史演变的两个学期的课程，思想逐渐清晰起来。父母去世后，在整理父亲的手稿时，又看了大量他写的东西，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最重要的转变是，他们去世一年后我退休了，有了大量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从那时开始使用微信，经常花大量时间看微信上的帖子。

微信是个好东西。中国人普遍不爱读书。2018 年人均读（纸质）书量只有 4.67 本，比起日本的 40 本、俄国的 55 本差得太远。但国人都爱看微信帖子。因此微信帖子的影响力非常大，是各种思想较量的最大战场，也是进行民主启蒙的有力工具。这些帖子所透露的信息完全打破了官媒的控制，使我打开了眼界。虽然有很多信息本来可以从父亲与别人的谈话中听到，但我记忆力差，根本记不住，而看微信则不同，可根据自己的理解程度掌握速度，重要的地方可反复看，看多个人的观点。看了这些东西，使我澄清了许多历史迷雾，想清了很多问题，增强了记忆力，积累了一些能量与知识。我一直记着父亲的话，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首先要进行民主思想的启蒙，和“需要一批具有独立人格、独立思想和独立批判精神的独立知识分子”。我虽然能力有限，写不出有力的文章，但至少可以转发一些我认为有助于民主启蒙和揭露真相的帖子，这也是在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尽一份绵薄之力了。

由于转发揭露毛的丑行的帖子，在两个群（亲属群和研究生同学群）里几乎同时受到毛左的辱骂，我立即毫不客气地进行了反击。以前我极少与别人争吵或辩论，那都是我的弱项。

这次，由于有了一定的积累有了底气，况且在微信上辩论，不用着急，可以想清楚了再回话，因此有了勇气。我有力的反击使我的对手无力招架，纷纷落马。讲道理他们讲不过我，但最后败下阵来的却是我：

在亲属群里辩论了几天，“长辈们”就指责我对长辈不尊重，面对这种不平等，我只好不再发声。

同学群里最先骂我、与我辩论最凶的是我们的班长，也是群主。在将近一年时断时续的辩论中，他和他的支持者们每次都被我驳得哑口无言。最后他利用群主的特权将我从群中删除。

家人和一些朋友都劝我不必和那些人辩论，不会有结果的。我却觉得，如果仅与他们个人辩论，确实不会有什么结果，但每个群里还有许多“观众”，我们的辩论也许对他们会有所触动，至少会促使他们多想些问题或换个角度看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些辩论对我本人是大有好处的：能提高分析能力、写作能力、记忆力；为了辩论，要查资料，可增长知识；为了应付可能到来的辩论，也使我对各种信息、各种理论更敏感、更关注；打赢了“嘴仗”，更使自卑感下降，自信心增强。因此，有个同事说我退休后像变了个人。

从我“败下阵来”的事实、我和越来越多的朋友的微信号反复被封、香港反送中事件中的乱象、李文亮事件、方方事件……可以看出，在中国，反民主的势力是强大的、顽固的、疯狂的，民主启蒙的任务任重道远。但反过来说，他们的疯狂正说明他们本质的虚弱和不自信。

几年来在微信中看到的大量优秀的知识分子在竭尽所能地用各种形式向大众宣传、解释民主的真谛，揭穿官方几十年来散布的历史和现实中的谎言；去年年底来到香港，在 YouTube 上又看到很多海外华人在用更系统的方式做着同样的事。看来，现在中国真正理解民主、有志于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大有人在，一个父亲所说的“具有独立人格、独立思想和独立批判精神的独立知识分子”群体正在形成，而且，借助网络的无穷力量，正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不可侮”，一个民主、自由、法治的中国的到来，是谁也挡不住的。

最后，献上仿陆游《示儿》诗一首：

示 考

休言民主分西东，此心此理九洲同。
宪政花开中华日，公祭敢忘告家翁。

2020年5月3日于香港